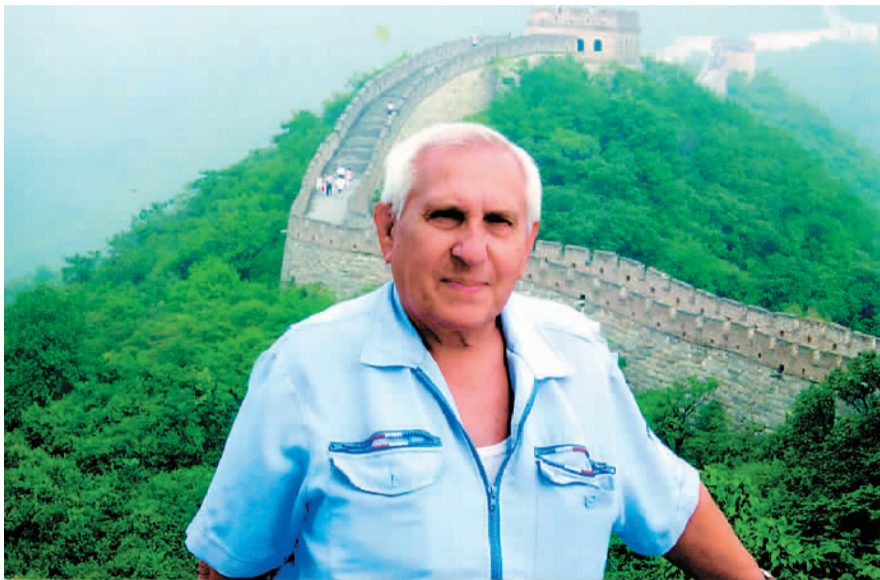


尤山度： 岁月不改中国情

徐宝锋



尤山度。



上世纪50年代，尤山度（中）为周恩来（右）做翻译。

受访者供图

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洋学生”。

1950年12月，5名罗马尼亚留学生、5名保加利亚留学生和4名匈牙利留学生陆续抵达清华大学，组成“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1951年1月和9月，又有10名波兰留学生、8名捷克斯洛伐克留学生和1名匈牙利留学生加入，“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留学生人数达到33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日后成为外交官、翻译家、汉学家，毕生从事中外文化交流事业，来自匈牙利的尤山度（Józsa Sándor）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匈牙利第一代汉学家，尤山度曾任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馆政务参赞，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领导人做过翻译，还出版或翻译了《中国与奥匈帝国》《毛泽东诗词三十一首》《我的前半生》等著作。在过去的70多年里，他的外交生涯、教学事业和翻译工作始终围绕着“中国”，为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匈人文交流、增进中匈两国民众相互了解作出了贡献。

难忘中国留学生涯

“我本科的专业是研究匈牙利近代史，那时从没见过会有机会到遥远的中国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谈及过往，94岁高龄的尤山度依然难掩内心的激动。

上世纪40年代末，读完匈牙利史本科专业的他，被分配到中学教课，不出意外的话，他会一直在匈牙利当中学教师。但是，一封来自布达佩斯的电报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

“1950年11月的一天，我收到一封电报，让我和其他几位大学毕业生出发去中国学习。兴奋、激动的同时，我也有些茫然。中国在哪里？中国什么样？这一切对于年轻的我，都是未知数。”尤山度说。

这次旅行，他和同学足足坐了15天火车，才从布达佩斯经莫斯科到达北京。此后，他的命运和中国牢牢连在了一起。

“当时我们在清华大学接受汉语培训，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北京很好的老师。他们原先是英国、美国大学里的客座教授，回国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尤山度评价他的中文启蒙老师们为“最高级、最亲密的老师”。他不仅学习了《史记》《三国志》等典籍中的历史故事，还接触到孔子、老子等思想家的学说。

“老师们不仅学识渊博，还很关心学生。他们经常会直接到学生宿舍嘘寒问暖，过年还会用保温瓶送来热气腾腾的饺子。”尤山度说。

在中国的5年，尤山度系统学习了中国历史、中国哲学等课程，熟练掌握了中文，为他日后从事翻译

和外交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访谈中，尤山度向我们展示了两枚珍贵的校徽，那是他在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期间的身份证明。“那时候，学生没有类似学生证之类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门卫都是靠校徽辨认身份。”尤山度说：“我至今保留着这两枚校徽，它们是我在中国留学生涯的见证，也是我与中国情缘的开始。”

编一套实用的汉语教材

1955年回国后，出于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尤山度主动要求去匈牙利中国科学历史研究所工作。那时的匈牙利外交部非常需要汉语人才，他在中国科学历史研究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被抽调进匈牙利外交部。原因很简单，他是当时唯一会说汉语的匈牙利人。

短短一年多时间，他为不少访问匈牙利的中国领导人做过翻译，这其中就包括朱德和周恩来。1956年1月，朱德访问匈牙利，尤山度担任官方翻译。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当时的匈牙利领导人送给朱德一柄特制的马刀，朱德兴奋地从刀鞘里抽出马刀，高高举起。尤山度在自传中骄傲地写道：“我作为当时唯一在场的翻译，就站在他身边，对我来说，那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这之后的20多年时间里，除在匈牙利驻华使馆工作外，尤山度长期在罗兰大学从事汉语教学与研究。除了培养汉语人才外，他最大的贡献就是编译了一套四册本的《汉语课本》教材。作为匈牙利第一套比较完整的汉语学习教材，这套教材现在还被不少匈牙利学校用于教学，也给当地汉语爱好者提供了便利。

“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匈牙利大学里的中文教材非常有限，仅有的几种教材不能完全满足匈牙利本土教学需要。”尤山度回忆说。他与同事高恩德决心结合自己的翻译经验以及汉语教学实际，选取中国最好的教材，改编为一套适合匈牙利学生使用的教材。教材问世后，尤山度自豪地说：“虽然我和高恩德直到退休还是副教授，但我们合作编写的这套教材，给无数匈牙利学生了解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这比什么职称头衔都重要。”

1988年—1991年，尤山度被北京外国语大学聘为客座教授，为中国学生讲授匈牙利历史。之后他就一直活跃在中匈文化交流的各个领域。

“做研究70多年，我的研究视野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这个研究对象。”年逾90，尤山度依然笔耕不辍，许多学术著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中国与奥匈帝国》基于他对中国和匈牙利两国历史与现实的深刻理解，将1949年后中国与匈牙利的关系与历史，完整记录下来，是非常珍贵的史料汇编。

从事翻译精益求精

因为在外交部做过口语翻译，尤山度有机会接触

到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他们的魅力与风采给年轻的尤山度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候我经常翻看《人民日报》，报纸上出现的毛泽东诗词深深吸引了我。我试着吟咏这些作品，用心体味诗词中的情怀和意境。”尤山度说。

对一个外国人而言，虽然学过中国近现代史，也通汉语，但要完全理解毛泽东诗词仍很困难。尤山度用心钻研，乐在其中。他想：“不如把它们翻译出来，这样不仅能在翻译的过程中学习，也能检验我是否真的读懂了这些诗词。”

通过查阅资料、与中国朋友探讨交流，尤山度整理和翻译了31首作品，以《毛泽东诗词三十一首》为书名，用中匈双语对照的形式在布达佩斯出版。书中除诗词原文的翻译外，还对每首诗进行了解读，并根据自己的理解配上了松树、石榴、昆仑山和长城等插图。

“我最喜欢《沁园春·长沙》和《沁园春·雪》，诗词中蕴含的那种‘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磅礴气势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壮阔情怀，开拓出一种诗词新境界。我还专门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名为《写诗的毛泽东》的后记，谈了对毛泽东和中国诗词的理解。”尤山度说。

《毛泽东诗词三十一首》中文部分出自当时匈牙利最好的中文书法家的手笔，并用红色印刷，书籍封面采用了当时最昂贵的丝绸封面，印制十分精良。尽管定价很高，作为第一部匈牙利语的毛泽东诗词作品，这本书还是很快就销售出3000册，在匈牙利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1959年，朱德访问匈牙利期间，匈牙利领导人还把这本书送给了朱德，请他转交给毛泽东。在尤山度看来，这是他作为一个汉学家所获得的殊荣。

尤山度对翻译精益求精，从不马虎。为了翻译好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尤山度特意到北京拜访了溥仪的弟弟溥杰，深入了解这本书背后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背景，这为透彻理解作品、准确翻译起到了重要作用。溥杰在尤山度完成译稿后还赠给尤山度两幅书法，称赞他高超的翻译技巧和严谨的翻译态度。

在回忆录《长城寻梦：跨越欧亚大陆》中，尤山度半开玩笑地将自己的成长经历及家族史称为他的前半生，把他与中国的关系称作他的后半生。“我退休以后，也没有停止中文教学和中国研究。我的一生都在和中国打交道。”这可以说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概括，也深情表达了他跟中国紧密的情感和生活联系。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海客
话中国

文化只眼

近日，《2022国民专注力洞察报告》出炉，其中提到，当代人的连续专注时长已从2000年的12秒下降到了如今的8秒，引发了关于阅读专注力的关注和讨论。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手机占用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人们通过公众号、短视频、消息推送等途径获取信息，通过社交软件、办公软件处理工作，通过购物软件、支付软件安顿生活，在不同界面间进行着注意力的转换。面对手机屏幕，我们在不断地浅阅读中消耗着精力，使得注意力日渐碎片化。久而久之，专注思考、自我反思的能力也在不知不觉间慢慢消磨，持续的专注力俨然变成一种“稀缺品”。

诚然，浅阅读作为一种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方式，对于解决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小问题颇有裨益，尤其是在获取一般知识、掌握特定技巧、方便日常生活等方面，非常高效、实用。但同时，也应注意避免将注意力和时间淹没在浩如烟海、应接不暇的各类信息中。做时间的主人，就是要对自己的注意力进行合理分配，多挤出一些时间深入阅读、专注思考、躬身审视。

深阅读作为个人行为，较少受外界干扰。在这种投入、忘我的阅读状态下，人们得以从生活的压力中短暂脱离出来，注意力从外在世界向内在世界转移，主动、持续、专注地吸纳养分。在这一过程中，人成为自己的主宰，掌握了自我发展的主动权，在“心与物游”的状态中，丰富自我、愉悦自我、提升自我，借此实现了人格的塑造与完善。

在笔者看来，深阅读不必过多在乎结果，也不用在乎花了多少时间、读了几部大部头的经典著作，它更多是一种心灵的享受。川端康成在《雪国》中有一句话：“孤独驱散了哀愁，蕴含着一种豪放的意志。”某种程度上，读书是孤独的，能让我们暂时抛开外面世界的精彩，专注于内心的平静；但它又是激越的，总能搅动我们的神经，获得智性顿悟或审美升华。陈晓明在《守望剩余的文学性》一书中说：“阅读伟大的作品，必然是伟大心灵的相互撞击，至少也是激情的相互交流。”世界很大，但在深阅读的时候，只有“我”和书在对话，没有生活中遇到的烦心事。或许有些平庸的我们，也能在这个过程中叩问那些伟大的灵魂，不断地向上向好。

在当下快节奏生活中，阻碍我们进行深阅读的一大原因是时间。即使只有碎片化的时间，只要能够坚持深阅读，以日拱一卒的精神形成习惯，就能从文本中感受到情感和思想的共鸣，收获人生与学问的洞见。

实际上，浅阅读与深阅读并行不悖、相互促进。希望我们都能抽出那么三两夜，或是周末午后，放下手机、翻开书本，当一个自在的读者，享受那种“读书不觉已春深”的美好。

移动互联网时代呼唤深阅读

陈航直

图片报道



5月22日，歌舞诗剧《礼赞生命·一起向未来》在四川省成都市新声剧场上演。该剧由四川残疾人艺术团倾力打造，40余名残疾人演员和6名手语老师用精湛的表演展现了对生命的礼赞。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加强东亚汉籍研究利用

胡志

4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为我国的古籍工作擘画了发展蓝图。近日，为进一步推动古籍文献收藏机构所藏文献的整理、研究及开发利用，以古籍文献整理出版为中心搭建海内外从业者沟通交流平台，由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第二届“古籍文献收藏、研究与整理出版”国际学术论坛在北京、桂林、温州三地同步召开。来自学术界、图书馆界和出版界的40余位专家学者相聚云端，围绕“东亚汉籍收藏、研究与整理出版”进行了探讨。

东亚汉籍具有丰富的历史遗存，是中华文明传播与东亚文明交流的重要媒介。东亚汉籍研究历来是海外古籍研究的重镇，梳理东亚汉籍的收藏、整理和传播情况，揭示其中文明塑造与互鉴的价值，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因此，本届论坛衔接首届“海外古籍文献的收藏、研究与整理出版”议题，聚焦“东亚汉籍”的整理和文献研究。

会上，围绕东亚汉籍的整理问题，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黄仕忠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其对日本所藏

中国戏曲文献的调查、整理、影印出版的研究情况。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副院长王勇介绍了近代东亚笔谈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情况，通过《大河内文书》整理与研究的案例，强调了新史料利用的重要性。南京大学文学院金程宇教授以其所藏朝鲜时期稀见汉诗文集四种为例，介绍了佚作考略和异文研究经验，呼吁增加文献收集，深度发掘和利用异本和善本，推动东亚汉籍研究。

东亚汉籍研究如何“新材料盖新房”是与会专家关注的话题。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吴国武从东亚汉籍圈层的各自特色和比较会通的角度，关注新旧、东西学术的交汇互动，探讨东亚古典学的现代建构，具有整体性视野。

会上，多家图书馆和古籍收藏机构还介绍了各自馆藏相关古籍文献概况，涵盖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区域汉籍文献，并围绕文献征集、整理、出版与数字化组织管理的经验，探讨了如何为推进东亚汉籍研究奠定文献基础。

新华社南昌5月21日电（记者袁慧晶）日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1.5万余件（套）新增珍贵文物名录，其中包含两枚明末清初画家八大山人的印章实物——“雪衲”和“传葵”。据悉，这两枚印章实物是目前被发现的仅有的八大山人印章实物。

朱耷，号八大山人，江西南昌人，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九世孙。八大山人在艺术上有独特的建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古代十大文化名人”之一。他以水墨写意著称，尤擅花鸟画。据奉新县文物管理部门负责人许彬彬介绍，两枚印章均为青田石材质，于2018年在奉新县耕香庵遗址中被发现。现经国家文物局委派专家组鉴定，“雪衲”“传葵”印章为八大山人用印，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其中，“雪衲”白文方印，高3.4厘米，印面边长1厘米；印面刻白文篆书“雪衲”二字，单刀浅刻行草边款“越徐都守白为雪个禅兄”两行十字，镌刻流畅。“传葵”白文方印，高1.6厘米，略呈大小头状；印面刻白文篆书“传葵”二字，笔画细劲犀利，无边款。据同治版《奉新县志》记载：“八大山人，明宗室

八大山人印章实物首次被发现

子，为诸生。国初弃家遁奉新山中，剃发为僧，居耕香庵，不数年竖拂称宗师。住山二十年，从学者常百余人。”

许彬彬说，山区的秀丽风光为八大山人提供了创作素材和灵感，这不问世事、寄情山水的二十年是他思想和艺术风格发生重大蜕变的时期。据文献记载，“雪衲”和“传葵”都是八大山人使用过的法号。其中，“雪衲”印款曾在八大山人的传世作品中出现过，如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的《传葵写生册》；而“传葵”印款是首次发现，以往只出现过“释传葵”印款。

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馆长周晓健说，1954年，奉新县曾发现八大山人的《个山小像》，是八大山人研究的重大突破。但八大山人在奉新生活、创作的十余年时间，仍然是研究的空白领域。这两枚印章实物的发现，既填补了这一空白，又为研究八大山人艺术、思想价值提供了有力的物证。

据考证，八大山人曾用印达100多枚，但在2018年以前未见有其印章实物面世，国内博物馆也未有收藏。